

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研究

● ZHENG FU XING WEI YU QI YE XING WEI YAN JIU ●

● 成都出版社 ●

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研究

编委会主任：陈敏之

编委：（按姓氏笔划为序）

王保畲 白心和 江学贵

向其臣 李铁锤 李林樱

张学果 胥洪秋 袁欣

韩晖 蒋顺序

主 编：李林樱

副主 编：李正一

· 成都出版社 · 一九九〇年 ·

60064/23
序
16

改革 10 年，成绩应当充分肯定，存在的问题也要摆透，对领导者来说，更是如此。这是党的十三届五中全会的精神。

正确的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必要前提。

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怎样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历史提出了这个问题，无可回避。这已不是什么属于未来的理论问题，而是紧迫的现实问题，必须回答。

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现实，并且与已经被列宁判处死刑的另一种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同时并存在一个地球上，已经半个多世纪。正象任何新生事物，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一样，社会主义当然不会例外，更何况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所未有的的一种创举，一种伟大的尝试。

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有些是先天性的，有些则属于后天。如果我们承认客观存在的一切现象都可以而且应当是科学研究的对象，那么，改革过程中的政府和企业行为，毫无疑问应当是科学研究所十分关心、注视的重要对象。

应当承认，现实的社会主义在其成长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都是前无先例的。因此，为着解决这些问题，谋求健

康发展所进行的改革，当然只能是一种探索性的努力。

改革，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在这里，政府和企业都是改革的主体；而政府是更主要的，因为企业的行为取决于政府。

任何行为，都是主体对特定的环境、条件所作出的一种反应，一种选择。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旨在改变现有的环境条件，使社会经济关系处在一种更加适宜、良好的环境、条件之中，从而使经济能够得到顺利发展。唯有政府才能自觉地进行这种自我改善，才有充分的力量和手段去改变现有的环境、条件，创造一种新的环境、条件，去影响并改变企业的行为。十分清楚，政府的行为(包括一切扶择、政策、措施)在这里具有决定意义。

改革，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并存的格局，变幻不定的国际形势，使改革所处的环境增加了复杂程度。在当前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条件下，研究政府和企业的行为，具有多大意义，是容易理解的。

有史以来的研究，都是对未来(或未知)的一种探索，只有被证明是成功的实践，才是对这些研究的真理性进行判定的唯一客观权威。对政府和企业行为的研究，目前还不过是一个开端，对这种研究的评价只能让位于未来的实践，而这种研究，无疑也还需要继续进行下去。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
上海市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陈敏之

1990年1月28日

目 录

序

- 当前调整中面临的矛盾和选择…………… 裴小林 (1)
- 建立科学的宏观调控机制是治本之道…… 王保仑 (11)
- 构造公有制条件下的市场经济…………… 陈敏之 (18)
- 1988-1989: 政府与企业行为分析…………… 孙 荃 (29)
- 论治理整顿中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
…………… 张郁平 王学峰 (38)
- 试论协调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经济行为
…………… 袁文平 黄 克 程民选 洪 昆 (46)
- 政府有效干预论…………… 魏后凯 (53)
- 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的关键在于
规范政府…………… 袁光平 (61)
- 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行为与企业行为
…………… 徐向艺 钟耕深 陈志军 (69)
- 论转换时期政府的市场组织功能…………… 陈家泽 (78)
- 规范行为 同舟共济
——遏制高速度时期两级政府与企业
的行为研究…………… 肖述祖 王影聪 (87)
- 建立产业结构调整的新机制…………… 马 骏 (96)
- 治理整顿必须切实改善政府经济行为…… 王 盾 (106)
- 治理整顿的关键: 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商品
经济利益分配机制…………… 武振荣 张 炜 (115)

红光系统管理法(简介)	王体杰 (127)
企业行为不合理探源	罗明生 (144)
企业行为及其合理化的探讨	钟吉宏 (151)
我国企业扩张行为的实证分析与整治对策	杨 喆 (158)
企业短期行为分析及其矫正	崔 敏 (168)
对城市集体工业企业发展问题的思考 ——兼谈成都精印包装总厂的经营之道	夏朝嘉 (177)
企业和社会系统中行为的短期化及其可调性	刘凤歧 徐德岭 (185)
企业行为规范化思考	袁达钧 何进日 (192)
从企业行为看我国经济改革的道路选择	张荐华 (199)
城市集体工业企业行为及发展研究	肖 笛 田 林 (208)
承包经营企业行为及其导向	路自成 (218)
十议改革	岳福斌 (228)
新秩序：治乱与建构	方立明 (239)
略论企业的“虚胀现象”及其治理对策	武振钧 (247)
耦合——企业与政府联系的方式和尺度	刘润葵 (252)
加快立法，强化法律在治理整顿中的作用	陈必生 (260)

地方政府被动调整经济的行为动因及其矫正	胥洪秋 (268)
农业生产中的政府行为刍议	邓崇祝 刘 忠 (277)
粮食生产中的地方政府决策行为剖析	孙自铎 (284)
论县级地方政府经济行为的转化	王跃进 (293)
价格波动：地方政府的货币行为	童运洪 (303)
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思考与银行的对策	段崇建 (311)
对政府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分析	陈 丹 (319)
论地方投资行为合理化	王建华 (328)
走出信贷平衡困境	
——探讨银行信用卡平衡设计	杨鹏展 (335)
试论中等城市政府对经济的间接管理	李德元 (345)
实施目标管理 优化政府行为	
——城市政府工作目标管理基本特征	
之我见	蔡 竞 (354)
试论城镇集体企业规模效益的形成机制	
	李英泰 黎文祥 庄永辉 (363)
浅谈治理整顿中建筑业的保护措施	陈统明 (371)
改革地方投资管理体制 规范地方政府投资	
行为	王比一 陈小平 (377)
后记	(386)

当前调整中面临的矛盾和选择

裴小林

目前，正面临新一轮经济调整时期。由于这次调整所面临的经济环境和体制背景与以往有所不同，因而这次调整有其特殊性，并会遇到一些特殊矛盾，也为发展和改革提供了新契机。

一、本次经济调整的特殊性

以往的历次调整都处在平均地求温饱的低收入发展阶段上，这次的调整却是在非均等地走向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上进行。这就使此次调整具有与以往不同的划阶段性转折特征。平均主义的格局被打破，各地区、各产业、各阶层和各集团的发展及利益格局的再调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不满和社会震动，使本次调整过程中的矛盾比以往要多得多，解决的难度要大得多。同时，以往的经济调整都基本处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此次调整却是在向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演变的过程中进行，这就使本次调整具有体制性转折特征(1981年的调整尚处在改革的发动期)。

以往调整的核心内容都是降低积累率，此次调整的实质内容应该是降低消费率。改革使我国的产业和企业开始追逐市场需求，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也随之发生了重大转折，其总特征是消费需求引导并带动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1978~1987年全国居民年均收入增长率(扣除物价因素)为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率的两倍。因此，使消费结构过快节奏变动带动的需求总量迅猛扩张，大大超过了产业结构慢变制约下的供给总量有限扩张，供求缺口被动态地拉大。这说明，本周期内新产生的通货膨胀根源是人均货币收入的增长大幅度地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消费品的旺盛的即期需求，强烈地刺激并拉动了消费品加工工业部门的生产和投资需求，但由于体制转轨过程中利益格局和资源配置格局发生较大变化，使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部门的发展仍然相对滞后。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长和消费品加工工业的持续高速增长(也包括80年代上半期农业的超常规增长)是从需求和供给两端刺激并支撑经济扩张和高速增长的两大支柱。但是，这种繁荣不可能持久。面对消费结构的惊险跳跃，我国供给结构中的消费品加工组装业暂时还能适应这一变化而快速跟进，但供给结构中的基础产业则被远远甩在后面。目前我国国内基础产业与加工工业的严重断裂已日趋严重，基础产业供给能力已难以再继续支撑这场“消费革命”所带来的经济繁荣，唯有通过调整，降低消费率，向基础产业增加投入和积累，经济才可能再度健康发展。

以往的膨胀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计划扩张。相应地，计划收缩的方式直接、集中、见效快；调整的资金流以流程短且相对简单的财政渠道为主；调整手段是自上而下地下行政

性死命令，靠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关系来调整。这次膨胀主要是分权体制引发的计划外膨胀，调整的方式难以直接、集中，因此见效慢；调整的资金渠道是信贷、财政并重。

二、调整中面临的矛盾和选择

调整，首当其冲的是压缩需求。主要压什么需求，即调整源头如何选择，决定着此次调整的成败。以往的调整是从抑制中间需求即投资品需求入手，那是因为膨胀源头就在中间需求。源头抓得对且准，见效自然快。这种调整以减少政府需求为代价，靠官对官的关系容易行得通，而且是以增消费、减积累，给人民实惠为结果，受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现在的情况是消费需求大于加工能力，加工能力又大于基础供给能力。所以，膨胀的源头是消费需求过大，只有压住它，才能压住加工工业的生产和投资需求，供给结构(产业结构)的扭曲状态才能够改善。目前的投资膨胀是消费膨胀引发的，如源头不治理，光治派生出来的需求，则很难治住。市场经济国家治理通货膨胀实质上都是首先从抑制工资收入总量和最终需求出发，并由此而压住了投资膨胀的势头。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等国之所以迟迟抑制不住通货膨胀，就是在治理膨胀源头上束手无策。

为什么以往砍基本建设，刺激消费需求，很快就把结构理顺了？因为以往调整时期的短线产业相对来说所需资本份额较小。农业主要是恢复和回升问题，轻工业的新增供给能力更容易形成。这些产业在调整期间一般都能迅速启动，靠增量的倾斜以增加供给，使供给结构(产业结构)在短期内就

能发生较大改观，并与需求结构对称起来。这样，结构性通货膨胀源也随之趋于消除，经济能够再次扩张，一般不会发生滞胀。所以，以往的调整，尽管都是压积累、增消费的主思路，但客观上都能起到优化供给结构，使其与需求结构相协调的作用。这告诉我们，无论是紧积累还是紧消费的调整主思路，调整时期的供给结构中起码要有一根支柱(调整时期的支柱产业是它在这期间扩张或增长很快，并能衔接供需关系)支持经济回升。

此次调整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进行。当通货膨胀尚未压下去时，我们至多只能做到使工资收入的增长略低于通货膨胀率(能做到这一点也要冒很大的风险)；由于居民怕货币贬值，一般都倾向于即期消费。以上两点决定调整初期很难紧缩住最终需求(压集团消费尽管是官对官的关系，相对好压，但其所占份额左右不了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一般只能是首先压缩中间需求，即目前所谓的长线产业。如果靠行政命令将长线硬压下去，还可能较快地实现存量要素重组，即要素从长线向短线转移，靠短线供给的增长支持经济回升，我们尚有可能较快渡过难关。但是我国经济目前还基本没有存量要素重组的机制；即使有，存量重组也是一个较长的痛苦过程，而且慢变量的新增供给能力形成比快变量要缓慢得多。那么，靠增量的短线倾斜如何？调整时期，增长速度有限，增量也很有限，而且增量对作为短线的基础产业是杯水车薪。这就表明，当经济扩张时期的支柱变成长线而被扼制住后，慢变量在调整时期又难以替代它而扩张成为支柱，较长时期内没有新支柱支持经济回升，速度相对停滞(所以此次调整很可能比以往任何一次的调整时间都要长)。由于中间需求

相对于最终需求是供给，它被扼制住后，最终需求又未能有效地被扼制，供求缺口进一步扩大，通货膨胀加剧。可怕的滞胀陷阱很可能就这样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出现。

从目前的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是在有意无意地，被动地向首先压中间需求的路子上走去。调整时期主要压需求是对的，但若同时忽视了供给，就是一种不全面的、消极的思路。压长线确实不无道理，但截长后(不一定能补短)，好象产业结构协调了，可是在抑制不住最终需求的情况下，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间的总距离却更大了。我们以往讲产业结构不合理，一般都是从其自身出发去判断，很少从它与需求结构间的关系去判断；我们以往讲调整产业结构总是从增量或狭义的存量要素出发，很少从广义的存量要素去考虑。这种体制性的眼界狭窄导致我们每次都是空着急后便无所作为。仔细分析，我国的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间的关系并非不顺畅，之所以现在表现得不顺畅，就是由于供给结构中还有一大块没有被启动作为供给去与收入、需求相衔接。目前来看，这一大块起码有房子、部分土地(如宅基地和自留地等)和中小企业。若用这部分供给把老百姓手里的钱置换过来往基础产业上投，则由于居民买了不动产，使加工工业的需求减旺，间接并有效地压住了长线，直接扩张了短线。这是一种从扩大供给出发，借助于中介要素来引导需求、压长线、增短线、存量调整的思路。

尽管 1988 年经济仍保持着高速度，但已接近临界点，一旦库存见底，供给与需求在临界点断裂，人们不去调整，速度也会自动地骤然跌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避免这种现象出现，而且不应该加剧速度的大落。因此要从现在就开始主

动降速，但又一定要缓降，同时着手考虑速度回升问题。以往的教训是走极端，从放纵以至支持高速度一下走到强压、管死速度。降速度一定要兼顾其与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以及与通货膨胀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动态关系决定着速度，速度又反过来影响二者关系。骤然降速，首先是骤然减少了供给，但需求的相对下降幅度肯定要小，下降时间也相对滞后。这时候最容易出现速度与通货膨胀的剪刀差，即速度大幅度地下来了，通货膨胀率却相应地上升了，其发展到极端就走向滞胀。这说明压速度既可能降低通货膨胀率，也可能推动通货膨胀率上涨。所以，我们对速度也应该是疏导，而不应管死。速度下降率应略低于但又不能太低于通货膨胀下降率，二者应同时缓缓地下降。

调整时期的速度结构应以短线扩张为主，但短线是慢变量，它替代长线需要一个相对较长的过程。因此，在速度结构的转换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出现速度支柱真空。即支撑目前速度的长线产业要逐步后撤，要与短线产业的崛起相交错。尤其1989年，长线产业的速度不可能也不应该大幅度地骤然下降。对速度的地区结构也不应一刀切。内地的经济周期总是比沿海慢半拍，内地的产业结构中农业、原材料、能源等基础产业的比重又较大。我们不应把内地那些尚处在扩张或高涨阶段的产业健康发展势头强压下去。

社会经济结构系统的长程调整，开放取向效果较好；短期调整则是相对封闭取向的效果较好。这是因为，在短期调整过程中，若受到外来的非本国所能控制的因素干扰，将使调整格局更复杂，更难实现预期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的进出口总规模不宜再进一步扩大。增加出口是在国内需求大

于供给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块国外的需求，会进一步拉动国内物价水平上涨。国内的通货膨胀加剧和工资的随之上升又会加大换汇成本，使我国外贸靠低价取胜的主要竞争手段效力速度减弱。目前的出口结构也不合理，长线产品出不去，就硬性扩大国内也很紧缺的短线产品出口，这种结构必然会受到国内需求结构的强制制约而难以为继。当然，紧缩也可能将部分长线产品挤出国内市场，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份额不会太大。因此，起码就目前国内经济形势来看，不是扩大出口的有利时机。国际经验也表明，任何国家在国内通货膨胀加剧时，强行扩大出口都只会适得其反。出口规模制约着进口规模。考虑到还债峰期的日益逼近，我国外贸还要进一步减少逆差，以便与“八五”期间的必须转为顺差相衔接。这意味着，进口规模还要相对缩小。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调整进口结构，多进一些对稳定国内市场起重大作用的关键产品，可进可不进的不进，可晚进的不早进。调整时期的进出口要符合调整时期的特征，要调剂余缺，配合短期治疗，送针送药。这与长期经济发展战略对进出口的要求是不同的。

紧缩前期，通货膨胀很可能加剧。一是因为历年累积过量超发的货币还远未被吸纳，因此还没有越过通货膨胀巅峰；巅峰期过后，通货膨胀率才会趋于下降。二是紧缩前期供给将首先受到紧缩，即供求之间的最大张口期也仍在后面。以上趋势都是主观意志无法改变的。短期内我们靠什么来吸纳过量货币呢？有人主张用高档消费品，这不失为一种选择，但不应该成为主要的选择。第一，这与抑制即期消费的调整大思路有矛盾。第二，由于许多家庭已置齐了高档消费品，剩余的大都属低收入家庭，靠他们来吸纳，吸纳过程

太长，并且造成谁不超前消费谁倒霉的社会意识。所以，回笼货币主要还靠卖房子、卖股票、出租土地和卖一部分中小企业。

短期滞胀很难避免，问题是千万不要酿成长期滞胀。关键在于农业能否回升，基础产业能否在调整的中后期获得相对较多的投资；核心是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的关系能否趋于改善。经济的重新扩张必须以投资的重新扩张为先导。问题是我们如何在调整期中筹集这笔所需数量不小的资金，如何转变和控制未来的投资结构，避免本周期扩张和高涨阶段投资结构失控的状况再次发生。若要使下一个经济周期不重蹈本周期的覆辙，就必须使此次调整的结构性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以及进一步的高级化目标相一致。

非均等地走向小康阶段和体制发生转轨，使赚钱的机会骤然增多，而最容易钻体制空隙，赚钱最快的是流通领域。供求缺口太大，体制太不规范，产生了使流通发生混乱的可能性空间。调整应从供给与需求两端，挤压目前过度膨胀的流通。调整前期，由于供需缺口可能进一步扩大，流通中的资金可能会继续增多，囤积居奇，趁势涨价等现象都可能发生。因此，抓紧整顿各种“公司”和“倒爷”，势在必行。调整后期，供求缺口缩小，很可能将相当一部分商业资金挤出流通领域。这笔资金的去向至关重要，目前流通中之所以滞留过量资金，一是利润率很高，二是政策一变容易撤退。撤退的资金不应闲置起来或转向消费，而要迫使其进入产业，最好是进入基础产业。

三、调整能否成为发展与改革的新契机

调整时期也就是经济周期的衰退期与低谷期，这一时期的最大发展特征是：社会经济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要发生剧烈的结构重组，这是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历史性拐点之一，因此是一种质的属性的结构变革。产业结构的重组就是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要靠破产、兼并、失业等一整套存量要素流动、转移、重组的机制来实现。其背后，破的是产权，转移的是产权，兼并的还是产权。一句话，重组是产权关系的重组，如果同属一个产权主体，就根本不存在破产、失业和兼并的问题。这已经远不是在“如何管”、“加强调控”的层次上进行技术再调整、手段再选择所能够解决的了。

此次调整所面临的发展和改革方面的矛盾既然都具有质的根本属性，就挑战性地向我们提出了以下问题：(1)对矛盾是解决，还是绕开；(2)若要解决，解决到什么程度；(3)解决的步骤和时间，即准备用多长时间来调整；(4)与扩张期的发展和改革如何衔接。对这些问题是取积极主动的姿态，还是取被动应付的姿态，对发展与改革的进程至关重要。矛盾不可能完全解决，也不可能完全绕开，但我们有可能使矛盾或趋于激化，或趋于缓和。如果不准备缓和矛盾，调整的时间就肯定要长，不过问题解决得也比较彻底。如产业结构问题，若拿出较长的时间调整，就可打下一个较好的结构基础，经济再扩张时遇到的矛盾就较小，结构效益也较高，扩张期和高涨期的持续时间会较长。若要被动地缓和矛盾，产业结构就仍旧比较扭曲，为扩张阶段埋下了隐患。当经济处于扩张期时，经济绷得很紧，调整结构的力度就弱多了，余地也小多了。如果从原点出发就存在着方向性的结构偏差，

那么越往后偏差越大，走不了多远又要被迫停下来调整。因此，对矛盾迟早总要解决。但在一定时期内，矛盾的解决数量和程度是有限的，尤其是解决带有质的属性的矛盾，带来的社会震动本来就很大，短期内都要解决，震动就愈发集中，搞不好会使破坏性作用大于建设性作用。如破产、兼并、失业等问题，尽管方向不会错，早晚要解决，但若步骤、战术选择不当，反而会延缓总体战略进程。

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已经沉重地拖拽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步伐。但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作程度不会也不应该取决于少数人的着急程度。调整时期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体制，否则，调整的范围将更广阔，联带的社会震动将更大，持续的时间将更长，使调整更难以确定和把握。可是，人们又担心，调整时期，政治体制改革若没有实质性进展，经济体制改革恐怕也较难取得实质性突破。这也许是我们面临的两大两难选择。

(作者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